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

郇道元



一、郦道元生活的历史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的年代，同时也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时期。这一时期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有着深远影响。与政治动荡相对比，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郦道元是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著作——《水经注》则是当时最著名的地理著作。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表达了他对统一祖国的愿望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通过对《水经注》的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地理学家的高尚思想和品质。他严谨、科学的治学方法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使《水经注》成为一部文字生动、内容丰富的不朽历史名著。经过后代学者对此书的不断研究，还形成了一门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学问——“郦学”，这是郦道元为后世留下的一项宝贵的文化财富。

众所周知，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结束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封建国家。由于秦统治者滥用民力，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在秦末农民起义的浪潮冲击下，秦朝的残暴统治只维持了15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了中国，开始了汉朝的长期统治。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两汉的版图总体上都超过了秦朝。长期的和平发展，统治阶级逐渐腐朽。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及全国。尤其是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更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经过几十年的封建军阀混战，中国出现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中国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的统一为时很短，中国再一次陷入分裂。部分王室和南北门阀地主集团在南方延续着统治，这就是东晋。在我国北方则出现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北方的混战直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才基本结束。在南方，东晋之后又存在宋、齐、梁、陈等四个王朝，被称为南朝。与之相对，北魏和由它分出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被称为北朝。南北朝的历史持续达150~160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最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400年国家分裂的局面。可见，魏晋南北朝是政局动荡的历史时期，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也是一个民族融合，思想解放，文化交流的时代。

秦汉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匈奴族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匈奴族为其它各少数民族做出了榜样，他们也积极地与中原王朝进行交往。从东汉末年起，由于双方政治、经济交流的不断深入，许多少数民族内迁到中原王朝的统治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五胡”：匈奴、羯、氐、羌、鲜卑。西晋末年各种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王朝统治瓦解，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北方先后建立了若干割据政权，古代的史学家称为“十六国”，实际并不止“十六国”，建立政权的也不止是“五胡”。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与汉族人民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劳作，最后都逐渐与汉族相融合了。汉族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汉族了：南方的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相融合，开发了我国的南方，北方汉族则吸收接纳了游牧民族的许多优秀文化内涵，显得更加勇于开拓进取。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由于融合了南北许多民族的成分，显得朝气蓬勃，奋发向上，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们的民族意识不再是过去的狭窄的观念，而是更加注意兼容并包，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这种进步观念在隋唐时期对社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

进步意义之一。隋唐时期的许多将相大臣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连皇族也有少数民族出身的嫌疑，但他们讲汉语，着汉服，能作诗作画，与汉人已经融为一体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隋唐以后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汉族人了，说不定，我们的先世就是当初挥鞭牧马人中的一员呢？

游牧民族虽落后于汉族的经济发展，但是相比之下思路开阔，敢于接纳新鲜事物，富于创新意识，隋唐盛世的出现与这种思想的广泛存在是有紧密关系的，许多汉人也从中受到启发，胸襟开阔，吸收了少数民族的优秀品质。

以上我们回顾了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概况。在一些封建史家笔下，这是个刀光剑影的黑暗时代，这当然是不对的，而在某些当代人的文章中，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仍有待于提高。如果我们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去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有着不同于秦汉、隋唐的特殊历史魄力，它的内容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只有真正了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背景，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入考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社会层面，考察这一时期某个人物的思想、功绩就更应充分了解这一时代的背景。

邴道元生活在北魏王朝统治时期，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有较深刻的认识。

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上文已经说过，鲜卑是“五胡”之一。有的学者认为鲜卑就是西伯利亚（siberia）的古译，也有学者认为鲜卑源于兴安岭南部山区，我们认为，实际上鲜卑族是多源的。这从它众多支派分布之广可以得到证实。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鲜卑族中的慕容，乞伏、秃发、拓跋、宇文等组成部分，先后在我国华北、西北地区建立多个割据政权，如慕容氏建立前燕、后燕、南燕等，乞伏氏的西秦，秃发氏的南凉，宇文氏的北周等等，其中以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版图最大，历时最久。北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

早期的拓跋部长期在兴安岭、蒙古草原东部游牧。当时以拓跋氏族为核心，建立了部落联盟。史书上说：“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大约是在东汉末年。后来拓跋部在部落酋长的率领下，和其它游牧部落一样，逐渐南下进入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三国时期拓跋部开始在今河套平原东部“逐水草而居”，由于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尤其适合畜牧业发展，拓跋部慢慢强大起来。16国时期，以拓跋部为首出现了一个被称为“代国”的地方政权，这是拓跋部向阶级社会迈进的重要一步。4世纪后期，拓跋部出现了一位有远见的首领拓跋珪。他对原来的社会组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拓跋部开始进行农业生产了。他建立起模仿汉族政权的政治制度，把首都从河套地区进一步南迁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附近），更加密切了与汉族的联系。平城是一座古老的城邑，汉高祖在这里曾被匈奴军队围困达7天之久。拓跋珪迁都后，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市建设，建起许多宫殿、庙宇和其它建筑物。拓跋珪还率领军队东征西讨，北魏的领土急剧扩张，到他死的时候已经控制了黄河北岸到燕山山脉的大部分地区，后代尊称拓跋珪为道武帝。

在拓跋珪的儿子明元帝在位时，南方的东晋已为刘宋取代，南朝的历史开始了。明元帝的儿子拓跋焘，也就是太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在他统治的20多年中，北魏进一步走向繁荣昌盛。他指挥拓跋部士兵连年对外作战，消灭了夏国、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占据了关中，河西走廊和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与南方的刘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北疆北魏象汉族

政权一样，在今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修筑长城，阻止了草原游牧部落柔然的侵扰，基本上统一了黄河流域，这是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持续了 130 多年的 16 国时期也就到此结束了，我国北方的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人民生活有了最基本的保障，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

拓跋焘还曾率兵进攻刘宗，公元 450 年北魏骑兵曾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给南朝刘宗政权以极大震动。北魏的声势至此已压倒南朝，当时的西域诸国如龟兹、疏勒、乌孙、鄯善、车师等却遣使进贡，高句丽，波斯也派使修好。武功之盛、声威之远，于此可见一斑。

在大举征伐的同时，拓跋焘也重文治，注意整顿吏治，任用了许多贤能廉洁的官员，其中许多是汉族知识分子，如崔浩、高允等。在他统治时期鲜卑族的各部与汉族的密切联系更加深入，他们的生产方式也在向农耕转化，这种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也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可以说太武帝的统治为北魏走向全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拓跋焘以后，北魏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精明强干的君主——孝文帝拓跋宏。

孝文帝于公元 491 年正式亲政时，年仅 25 岁，可谓风华正盛，意气风发之时。他励精图治，大胆革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史学家统称为孝文帝改革。他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鲜卑民族素质，努力改革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长期游牧习气，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向汉族学习，最终推动汉化进程。他改变了拓跋部长期的辫发制，改用汉族的束发发式。着汉服，用汉族礼仪，大力宣传儒家思想观念，恢复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重修了孔庙。着手封建学术文化的恢复开展，如设立官学，搜求古书等等。他的这此举措，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民族的汉化过程，同时也得到了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支持，郗道元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已经把北魏王朝看成为一个继承了汉族文化的封建正统王朝了。从拓跋焘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以来，日见成效的北魏汉化，到孝文帝统治末期已经基本完成了。

孝文帝改革的重大举措是迁都洛阳。在拓跋焘时北魏已统一了北方，而且北魏的疆土不断向西、向南扩张，平城却偏在一隅，与这种形势显然已不相适应，孝文帝还曾表示要统一全国的决心，迁都问题就日益突出表现出来了。拓跋宏知道要“经营天下”，平城是难以满足作为一个大帝国首都的各项条件的，首先难以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平城的道路虽经多年修建，但因处于山区，与广大平原地区的联系仍很困难，另外还有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和其它社会问题。而洛阳是中原名城，作过几个王朝的都城。迁都洛阳无疑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这是孝文帝最为看中的。况且洛阳居天下之中，可谓四方辐辏之地，与各地区交往都很便捷，对于一个正在发展的帝国来讲，选它为都，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自然，任何改革的实行中都会有反对派，孝文帝改革也不例外，他们大多为鲜卑贵族，长期以来在平城地区发展势力，作威作福，形成了一个守旧的利益集团。为了保持特权，他们极力反对迁都。孝文帝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阻挠而停步，他多次与守旧派进行论战，最后冲破阻力，于公元 494 年正式迁都洛阳。同年还正式下诏禁止穿胡服。两年以后，孝文帝又宣布改变鲜卑族的姓名，把拓跋氏改为汉姓元氏，拓跋宏就改称元宏。孝文帝认为，拓跋代表着土地，与古代的黄帝有血缘关系，黄土地是“万物之元”，所以应改姓元氏。从他的话语中我们看到的是汉族儒家思想观念，可见北魏时鲜卑族的汉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不只是自己改，

王族的姓氏拓跋均改为元。其它的少数族姓氏也都改变为汉姓或逐渐向汉姓转化，如达奚氏改奚氏，拔拔氏改长孙氏，丘称穆陡氏改穆氏，步六孤氏改陆氏，贺赖氏改贺氏，独孤氏改刘氏，尉迟氏改尉氏等等，不胜枚举。这样一来，单从姓氏上，汉人与非汉人已经难于区分了。此举也是汉化过程的最后一步。

在大力推进改革的同时，元宏还大举南征，着手进行统一大业。他曾几次亲自率军与南朝齐政权作战，在战场上取得多次胜利，北魏疆土再次向南扩展。在孝文帝时期北魏的国势达到了全盛。

正当孝文帝的事业处于顶峰之时，保守势力在后方多次叛乱反对改革，元宏不得不派大军平叛，宫中又出现宫闱丑闻，再加上连年忙于国事，元宏没有经得住这么多打击，他的心情开始变糟，身体状况日见下降，但他仍坚持率军南征，在他 33 岁之年，不幸病逝于行军途中。

孝文帝的突然去世成为北魏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广大的帝国由于失去了杰出的领袖，而开始走下坡路。孝文帝死后 8 年，公元 507 年，北魏在与南朝梁政权的淮水之战中大败，北魏在军事上还不曾有这样的惨败。后来北方又有 6 镇起义，在洛阳统治者更不思进取，日益腐化，政权威信急剧下降。到公元 534 年北魏最终分裂为东西魏两个政权，这两个政权都是傀儡政权，没过多久，他们的统治就先后被北齐，北周所取代了。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动荡的年代里，为了躲避战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流民高潮，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人民（以汉族为主）大量向周围地区迁移。大部分流民是向南方移动，当时的长江以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能与北方相比，大量北方农民的迁移必然使南方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到南朝时已相当富庶。也有一些农民迁到河西走廊、辽东等与那里的少数族一起开发边疆，而内迁的各少数族人民在迁到中原以后，在与当地汉族人民的长期生活中逐渐地适应了农耕生活，自觉放弃了原来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如此规模的民族大迁徙，加速了民族融合，也极大地开阔了各族人民的眼界，改变了原来国内人口分布的不合理状态。各族人民对地理知识的渴望，也在这一时期突出表现现来。大量的地理著作问世了，其中不乏名作，而且内容丰富，全国许多地区都有了自己的地理介绍专著。有的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为“地理大交流”的时代。

规模巨大的地理大交流，为许多地理学家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地理实践机会。（资料和实践是地理研究的两大要素）。这时的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不仅在地理资料上左右逢源，其中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地理大交流，反映了大量的实践结果，这是前代的地理学者和地理著作无法比拟的。

当时人们地理学思想在其它非地理作品中也有体现。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用真切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北方草原的自然风光，不是身临其境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

在这个地理大交流的时代，在所有的地理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郦道元，他的著作《水经注》则是这个时代中一切地理著作中的上乘之作。地理大交流的时代使郦道元能有这样的造诣。《水经注》一书中记载了他在野外考察中取得的大量成果，这就表明郦道元同其他地理学者一样，有大量的实践经验。由于当时南北分裂，郦道元不能亲到南方，于是他就广泛搜求南方的地理著作，进行对比研究，作出自己的结论。他在《水经注》中注明引

用他人的著述，据统计已超过 430 种，实际上当然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这些著作大部分都是同时期人们的作品。可见地理大交流的伟大历史时代，对于郦道元地学思想和《水经注》的写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郦道元的家世和生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有许多独特的时代特征。尤其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郦道元就是生活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

郦道元所在的郦氏家族，据说是汉大将军郦商的后代，世居华北。在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内迁的时候，郦氏家族没有迁往他乡，继续留居华北，并且参与了少数族政权机构。郦道元的曾祖父郦绍在鲜卑慕容氏的后燕政权中任郡太守。拓跋珪南征时，他便举郡迎降了，北魏继续给予任用，这与北魏政权重视汉族知识分子，官僚士大夫的政策是相一致的。郦道元的祖父郦嵩也官至天水太守。

从郦道元的父亲郦范起，郦家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郦范在明元帝时被任命为给事东宫。东宫是太子所居之处，这是一个侍候和教育太子的重要职位。这位太子就是拓跋焘。把这个官职交给一个汉族知识分子来担任，表明了北魏统治者“变夷为夏”的既定政策，也说明郦氏家族受到北魏王室的高度信任。拓跋焘即位后立刻晋封郦范为男爵。拓跋焘死后，又被晋封为子爵。在平定山东地区的战事中，郦范立有战功，又封侯爵。到了孝文帝在位期间，郦范已经获得了外姓功臣的最高爵位——公。他在北魏政权中为官达 50 年，经历了 5 位君主，从一个没有爵位的给事东宫，成为北魏王朝的宠臣之一。他平步青云的历官道路反映了汉族知识分子在北魏朝廷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这也是民族融合的真实体现。

在郦范一生中曾两次出任青州刺史。在第二次出任青州刺史时，他已有了北魏王朝的最高封爵，有重要政治意义。孝文帝志在统一天下，而青州是进兵江南的重要后方基地，具有战略意义。

郦道元在这时已经步入仕途。他在《水经注》上讲自己在太和十八年时（公元 494 年）曾随孝文帝巡视北方，当时他任尚书郎。当时正当孝文帝迁都之际，这个英明的决策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郦道元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尚书郎虽然职位不高，但能随皇帝北巡却可见对他的重视。这给郦道元的仕途开了一个好头。

郦道元，字善长，是范阳涿州人（今河北省涿县）。他家乡称为郦亭。在《水经注》的《巨马水注》中，他较详细地介绍了家乡的情况。郦亭旁边的郦沟水是巨马水（今拒马河）的一条支流，郦道元的祖上就生活在这里。

关于郦道元出生的具体年代，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说明，许多学者根据《水经注》的一句话作出多种推测，尚无一致结论，大约郦道元出生于孝文帝即位初年。太和十八年时他曾随拓跋宏出巡，当时还是个小官。由于父亲是朝廷重臣，他的升迁还是较顺利的。郦范死后，继续了父亲的爵位，被封为永宁伯。

道元的仕途虽不如其父那样坦荡，但凭着自己的能力也有多次升迁。从太尉掾开始，他历任治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颍川，鲁阳等郡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黄门侍郎、侍中兼摄行台尚书、御史中尉等职。后几

项官职如河南尹（相当于首都市长、卫戍司令）、御史中尉（管监察）等都是三品官，已经属于高级官吏了。在孝昌3年（公元527年）任关右大使时遇害，朝廷追赠他吏部尚书、冀州刺史。

酈道元为政，史书上称是“威猛为治”，“威猛为政”，有的史书还把他的传记列入“酷吏传”，这就有失公允了。酈道元所生活的时期正当北魏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道元可能认为这时应当“乱世用重典”。在任地方官时他一方面威猛为政，同时还在地方上兴办学校，恢复发展文化事业。完全不是人们意象中的“酷吏”。道元还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好官，尤其表现在他同皇宫中恶势力的斗争上。王室中的败类元微曾诬陷自己的叔父元渊，由于官员宋游道能站出来说明事实真相，元渊才得以昭雪，而酈道元是支持宋游道的作法的，并且认为是气节可嘉，委以官职。道元的行为触动了元微的利益，于是元微迁怒于他，史书称为“素忌道元”。另一个王室纨绔子弟元悦则有心理变态的症状，他纵容小人丘念无恶不作。干扰正常的行政官员的选用制度。当时酈道元正任御史中尉，他果断地将丘念逮捕。元悦又请太后为丘念说情，酈道元坚决依法办事处死了丘念，并以此弹劾元悦。以上这两件事都表明道元为官刚正，疾恶如仇，而且不惧权贵，甚至皇亲，敢于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元悦从此怀恨在心。当时雍州刺史萧宝寅正准备叛乱，元悦就怂恿太后任道元为关右大使去监视萧宝寅，结果道元被叛军在驿站截杀。这种行为是多么可耻啊！可见，所谓“酷吏”的恶名是不能强加在道元名下的，至于有的史书将道元列入“酷吏传”，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这是受到了权贵们的排挤，于是24史之一——《魏书》的作者就依附了恶势力的权势，故意把道元列入“酷吏传”。24史中的另一部——《北史》的作者在给道元作传时，已经有了改变，经过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酈道元不仅不是所谓“酷吏”，而且称得上是位可与包公、海瑞相比的“好官”。值得我们后人敬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权贵和恶势力可以用阴谋手段在当时打倒一个人，确是易如反掌。但是最公正的还是历史。人们常说“历史是无情的”，即一切是非功过，后世自有公论，谁也不能一手遮天，欺骗历史，否则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正义的人民所唾弃。

在当时的朝廷中，道元还是较受重用的，因为他的勇敢和果断，还曾多次临危受命。见于正史的就有一次。第一次安抚北疆，第二次镇压与南梁接壤地区的叛乱，第三次就是到关中监视有叛乱嫌疑的萧宝寅。最终道元在最后一次出行中蒙难，这就可以说明他具有赴汤蹈火的果断和勇敢的品质。

酈道元的清正虽已为我们了解，但是他不仅是一位“好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出色的古代地理学家。当然，他的地理学识主要是通过《水经注》为人所知的，他在为《水经》作注时明确指名引用的文献达480种，其中属于地理类的有109种。这109种中，属于魏晋南北朝这个“地理大交流”时代的就有89种。一方面反映了酈道元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也可看出这一“地理大交流”时期地理著作对他的深刻影响。

作为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道元在《水经注》的序言中对前代的著名地理著作进行了批评点评。秦朝以前我国已经有了许多地理类书籍，但当时由于国家不统一，生产力水平尚不够发达，人们对地理的概念还比较模糊，这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虚构。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禹贡》等。我们认为这种虚构是受当时社会条件限制的，不必过分苛求。在这种虚构中我们仍能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情况直到秦汉时期仍有一定市场，与

人们相求真正了解地理知识的需要发生矛盾。郦道元是坚决反对这种“虚构地理学”的。他提倡严谨的学风，改变这种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他在《水经注》序中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和工作方法。其主要原则就是重视野外考察的重要性。前代地理学者中已有人开始考察研究工作，但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常说科学的基础是真实，地理学当然更需要真实，郦道元可以说开创了我国古代“写实地理学”的历史。

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当时的欧洲历史正是所谓“黑暗时代”，全欧洲在地理学界都找不出一个杰出的学者。郦道元在世界地理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郦道元的思想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概况，在这个国家分裂的年代，社会生产，人民生活都受到很大破坏。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要求结束无止境的战争，开始和平安定的生活。许多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作品里也反映了这种呼声。《水经注》就是其中之一，从中我们看到郦道元的爱国主义思想几乎是无处不在。

对于一个生在乱世的人来说，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明显表现为希望国家早日统一这一目标和愿望。

郦道元出身于世代官宦家族，这种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开始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水经注》中经常引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注文中也表现了他对尧舜等古代圣王和孔孟等儒家大师的崇拜。儒家思想是希望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所以郦道元的思想也是以此为基准。长期的国家分裂，使他希望国家重新统一的愿望更加强烈。他的青年时代正是北魏政权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之时，而南朝则显得朝政腐败，毫无生气。他的家族又受到重用，拓跋氏的“取夏变夷”的改革，都促使他产生了由北魏统一中国的思想。道元入仕不久就成为元宏北巡的随员之一，这说明他的才干已得到朝廷的赏识。元宏的改革，使他坚信长期分裂局面将会在元宏的统治下结束，秦汉的大一统国家又将出现。孝文帝的英年早逝对道元的打击很大。北魏国势从此江河日下。他看到统一无望，于是开始潜心于《水经注》的撰写，通过写作以寄托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统一祖国的渴望。

《水经》是三国时魏国人的作品，对道元来说，它算不得什么稀见的古籍。道元选择为它作注，主要是考虑到《水经》的涉及范围很广（当然还有地理学原因），正可以借为它作注的机会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水经注》的撰写在郦道元生活的后期，这时的北魏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道元看到已不可挽回，于是把全部爱国主义情感都倾注在《水经注》这部巨著之中。

《水经注》虽以为《水经》作注为形式，但并不受《水经》原有体系的限制。《水经注》的著述范围是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的。这是他祖国统一思想的反映。而且有时《水经》范围并不包罗西汉版图。如现今海南岛，西汉曾一度设了两个郡，但不久就废弃了，但郦元并未放过，把它们附在《温水注》之后，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由于北魏后期的衰败，道元已对北魏统一没有希望了，在《水经注》中，就没有这样的政治倾向。尽管他终生服官于北魏，但在《水经注》中却看不

到对南朝政权的敌视，不以南北为鸿沟，甚至多次出现南朝政权的年号。全书在卷五注中第一次出现了南朝年号，“宋元嘉 27 年，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平碛隰（地名）守之。”元嘉是南朝中宋政权第三个皇帝宋文帝的年号，元嘉 27 年（公元 450 年）与北魏太平真君 11 年是同一年。也就是这一年，拓跋焘曾大举南下，而酈道元无意在这一年中另一场南北战争中使用南朝“敌国”的年号，如果我们联系到道元一家在北魏政权中所受的重用，就会为道元的这一笔法所折服。由于长期分裂南北朝互为“敌国”，互相诬蔑的例子举不胜举，前面提到的魏收的《魏书》就是其中之一，而早于《魏书》的《水经注》能用平和的笔调来叙述南北战争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在《水经注》40 卷的篇幅中，卷五的例子并非少见，卷 28 以后更是多次使用南朝年号。有学者认为一句是道元在完成全稿后加上的，正表明了道元后期对南北朝观点的变化。如前所述，道元晚年对北魏已不抱希望，南朝同样不能成大器。故道元承认了南北对立的客观现实，而回避南朝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与他向往祖国统一的愿望不相符。为此，他更应南北兼顾，不忘南方的半壁河山，于是他采取了这种方法。道元在晚年已经改变了原来尊北卑南的写作基础，这也是他政治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

人生活在人自然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大自然的恩惠。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酈道元也是一个热爱自然的学者。明代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的事迹不少人都有所了解，其实他在许多方面是继承了酈道元，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是酈道元爱国主义思想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凡酈道元足迹所到之处，无不细心考察，对古代名胜古迹，自然风景大多收入注文之中。对家乡酈亭的描写，抒发了他对故土的热爱。对青州的描写，也是对各地风光赞颂的成功一例。如果是那些他不能亲自到远的山水胜地，他必搜集大量材料，细心选取，然后进行加工整理。由于他有实践基础和严谨的态度，再加上高超的写作手法，《水经注》中描写山川的锦绣文章可以说是俯首皆是，其中有两篇历来为人们传诵，成为千古杰作。近代以来还常常被选为中学甚至大学的课文。

一篇是记述黄河孟门（即现在的壶口）瀑布，一篇是描写三峡的。孟门离北魏的首都平城、洛阳都不很远，道元很可能去过多次，注文虽只有一百多字，却把那里壮观的景色形象生动地摆在读者眼前。道元写道：“（孟门）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贝怒，鼓若山腾，浚波颓迭，迄于下口。”读到这，仿佛黄河水的飞沫已经溅到我们的身上，虽未到其地，孟门瀑布的宏伟气势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瀑布两侧山势紧逼使黄河河道在这里紧缩到 30—50 米，好象壶口倒悬，如壶水外倒，所以现在称为壶口。水流从约 30 米的高处泻下，形成了注文中描述的奇景。

《水经注》中描写长江三峡的篇幅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一段在卷 34 的注文中：“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天，略无阙处，重岩迭峰，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sù 同沂）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山巖（山峰）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

裳。”

读了这 150 多字，大家一定会不由想起李白的那首七绝《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实际上李白这首诗的内容是从这段注文中引来的。到过三峡的人反过来再读这段文字一定会觉得毫厘不差，当然现在的三峡已经没有猿了。

别看郦道元把三峡描写得这么出神入画，实际上郦道元是从来却没有到过三峡的。当时北魏的疆界南到秦岭、淮河一线，而三峡地区是南朝控制的地盘。道元对不能亲临的地方，总是全力搜集那里的文献。象三峡这样的名胜当然不会例外。在描述三峡的众多著作文章中，他利用最多的是东晋时曾任宜都（今湖北省宜昌一带）太守的袁山松所撰的《宜都山川记》（又作《宜都记》）一书。由于袁山松曾任宜都太守，所以他所写的这本书的真实可靠性是非常高的。道元正是看重了这一点，对《宜都记》非常重视。上边这段文字就是在袁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而且凭着深厚的文学、语言文字底蕴，道元的注文更加强细腻形象，已超过了袁文的水平。对于山峡，《水经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相比之下，这段描写比上边对孟门瀑布的描述更为成功和著名。

郦道元对祖国河山描写的巨大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高超的文字技巧和扎实的儒家学术功底，虽一方面应归功于他对祖国河山的真挚感情。在这种情感的驱动下，他才能写出众多的不朽篇章，为后世留下可观的文学财富。象三峡，孟门的描写正是突出表现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真情实感。

爱国主义思想是郦道元写作《水经注》的主导思想，从某种角度讲，《水经注》就是他本人的自传。从中我们可以研究了解郦道元的思想。所以我们在分析他的思想时都是结合《水经注》的内容来研究的。

《水经注》是一部以水道为纲的区域地理著作。以河流的流域作为区域划分的标准。这样在注文中的自然地理要素中首先涉及的就是河流，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水经注》更注意人和水的关系。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把水提到极高的地位，这可能是他选择为《水经》作注的另一个原因。在古代农业社会中，水是农业的命脉，他十分注意水利工程。表现在《水经注》中，记载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

陂湖即小型人工湖，是古代农田水利工程的主要内容，《水经注》记载的各类陂湖达 560 个左右。面积大，位置清楚的有几十处。如卷 32《肥水注》说芍陂“周百二十里”卷四十《浙江水注》讲长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芍陂是我国淮河流域最高的大型水利工程。长湖现称鉴湖，是我国东南地区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这些记载如仅从水利史角度讲也是非常珍贵的。

《水经注》还非常重视河渠水利工程，如堤、塘、堰等。如卷 14《鲍丘水注》记载了三国时魏刘靖在北京修建车箱渠的情况：“长岸峻固，直载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依北岸立水门……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如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在把河水束缚在人工渠道内以后，左河北岸再开水门。在山洪来临时，关闭水门，洪水流走。平时则可随时开关水门，把水引入田间灌溉。道元的记述简单明了，给后代了解三国时北京的水利工程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史料。后来东箱渠又经扩建，所灌溉的农田达到万顷，对北京地区农业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卷 16《沮水注》、卷 33《江水注》还分别记载了郑渠和都安堰这两处工程。其它各卷中提到的人工河渠还有很多，它们对当地农业的稳定发展无疑都起了重大作用。道元这样大量记

述水利工程，表现了他对农业的重视和对人水关系的注目。因此他对兴建和毁坏水利工程的事是褒贬分明的。对于兴修水利的人他一直是称赞的，如在卷 10《浊漳水注》中他着重写了西门豹、史起的治水功绩。

水一方面为人类造福，同时也在给人类制造麻烦。有时人们还会面临灭顶之灾，这就是水害。《水经注》中就记载了历代大量水灾资料。水对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中不可能离开水。在战争中，水还往往起到重要作用。出于对水的重视，在《水经注》中多次描述了战争中以水制敌的情形。如卷 5《河水注》记载了北魏攻宋虎牢城的故事。魏军攻城 200 天不下。城中只有一口 40 丈深的水井，于是魏兵挖地道把井水引走，城内守军因为无水只好投降。道元曾亲自查看了当年魏军掘的地道，“穴处犹存”，井水在战争中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道元是很清楚的。可悲的是，道元在被叛军围于驿站时，由于驿在岗上，而井在岗下，所以不能久持，道元因此遇害。这是道元没有料到的。

郦道元是一位充分理解人与水关系的学者，他认为“水德含和，变通在我。”这是他对人水关系的总结，这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是他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正确认识。

郦道元虽曾代表北魏政权外出平叛作战，但他是一个坚决反对战争的人。魏晋南北朝时代南北分裂，战争频繁，大量人民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但是战争频仍的事实却是道元不能回避的，实际上道元正是通过对战争残酷性的描述，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态度。如卷 9《沁水注》记载白起抗杀赵卒 40 万，卷 9《淇水注》记公孙瓒打败黄巾军，“斩首 3 万，血流丹水”。卷 22《渠水注》记晋军 10 余万被石勒消灭，“尸积如山”。对这些血腥的战争场面，道元多不发表自己主张，其实在字里行间已经看出对这种战争的厌恶。在有时他也用极简单的语言对暴行进行抨击。在卷 5、25、34 对袁绍、曹操、杜预等人对无辜百姓的屠杀，道元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郦道元生长在战争不断的年代，而且直接参与过战争，但实际上他是反对战争的，尤其是滥杀无辜，毫无意义的内战。他所希望的战争是一场能统一全国的正义战争。

《水经注》在描述人水关系时，很多时候是要述及对人的看法的。郦道元有的是借用古人古书发挥，有时也表达自己的意见，都有一个明显的疾恶扬善的立场。

在郦道元分辨善恶的标准中，儒家教育有着深刻影响。《水经注》卷 6《汾水注》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东汉时政府准备在汾水和呼沱河之间开挖一条运河，如果成功，象今太原等地都可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了。但是由于地形不便，工程相当浩大，开工几年，工程没成功，还死了好多人。主持工程的官员邓洲在考察了工程难度后，果断地请求朝廷下令停工。他的请求得到批准，虽说运河没有修成，可是却使剩下的几千名河工都保住了性命，对此，道元并没有谴责，并借古人之口认为这是“积善”之举。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道元的为人，他可以说是一个“好官”，敢于反抗权贵，这在《水经注》中也有反映。在卷 2《河水注》、卷 22《渠经注》两处通过小孩之口表达了对郭伋、鲁恭这两位古代良吏（也就是好官）的赞扬。在卷 40《渐江水注》中又写了老年人赞扬好官刘宠的事。刘宠在作郡太守时废除苛捐杂税，整顿社会秩序，使地方面貌为之一新。隐居山中的几个老人也知道了刘宠的政绩。不久刘宠被调入京城为官，老人们知道消息都赶来送行，而且每个人都要把一百个大钱送给刘宠。刘宠谦让多次，实在推辞不过，

最后只好从每一百大钱中接受一个大钱，这件事被后世传为佳话，在刘宠接受父老一文大钱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钱清”，这个地名到现在还保留着。其实象酈道元所称道的这些良吏的事迹对今天不是也有实际意义吗？酈道元在称赞这样的好官的同时，也是表明了自己为官为人的基本立场，通过道元的一生可见，他确实是以作一名良吏来要求自己的，而且比刘宠等人做得还好。

在《水经注》中，酈道元除了扬善以外，同样议论了一些坏人坏事。想到道元对权贵的仇视，可以想象他对坏人坏事的谴责也是很严厉的。卷九《淇水注》记述了一般关于商纣王的故事：一位老人在清晨时分准备过河，但由于身体不适渡河很困难。商纣王问身边的人“是什么原因使老人不能过河而在河边痛苦呻吟呢？”侍从说：“大概是天冷，使老人原来的骨疼的毛病又发作了。”纣王竟然命人砍断老人的腿，查看老人的腿骨。纣王的残暴之举仅仅数语，已经很清楚了，这完全是一个视百姓如草芥的暴君。酈道元在此对纣王并没有表示明确的厌恶。但他疾恶扬善的本意已经表达得十分鲜明。

以上我们联系《水经注》分析了酈道元的思想，首先他是爱国主义者，同时还具有优秀的品质如疾恶如仇，反对屠杀，反对无义的战争，坚信人定胜天等等，此外，酈道元还不信鬼神，遇到必须澄清的事实时，他一般总要经过分析和研究，打破原来的神怪故事，进而揭示出事情的本来面目。卷4《河水注》中记述了一个关于铜翁仲的故事。秦始皇曾收全国民间的武器铸成十二个大金人（就是铜人，当时称铜为金），铜翁仲就是这些铜人。后代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些铜人的传说。这一卷（古代书籍分卷而不分册）中就收录了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把黄河水道中的大漩涡说成是因为铜人沉在河底造成的。道元虽把这个故事讲得很细，其实，他并不太相信。大漩涡的位置在今河南三门峡附近，春秋时是虢国领地，当地的一座山就称为虢山。道元在另一历史名籍《史记》发现在战国时，这座山曾经发生山崩，使黄河水道为之阻塞。而传说铜翁仲每个都重达几十万斤，秦朝灭亡后有九人都化成铜钱，另三个则下落不明传说纷纭。有的说是有人把铜人推到黄河里了。在没有大型运输工具的古代，搬运这个宠然大物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何况把它推入黄河又有什么意义呢？相比之下，尽管传说有声有色，却经不住推敲，酈道元的细致考察分析一下就使它不攻自破了。

古代人们不仅迷信而且还崇尚厚葬，希望在“阴间”也能过上好日子，那些腐朽的统治者更是为修坟造墓而大兴土木。秦始皇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水经注》卷19《渭水注》中详细描述了秦始皇地陵的陈设布置。道元并未直接说秦始皇不对，他只写了两个字做引子：“大兴厚葬”。巧妙的是，在备述秦陵情况以后紧接着写了项羽率军入咸阳（秦的首都）后对它的破坏“以30万人，30日运物不能穷……火延30日不能灭。”三个“三十”两个“不能”，已经表达了道元对厚葬的嘲弄，特别是对那些穷奢极欲的统治者们的蔑视之情。

四、酈道元的治学

酈道元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由此，在特定的封建时代他能成为一个“好官”，同时他还是一名学者，在治学上，他同样有一套严谨成熟的方法。

史书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还记载了他曾撰有《水经注》40卷，

《本志》13篇，《七聘》和其他文章。但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水经注》，其他著作都散失了，我们还只能从《水经注》中来分析了解酈道元的治学方法。

《水经》原来并不长，但道元所作注文却达30多万字。同时《水经注》还是一部牵涉面极广的巨著。地理范围涉及当时不少境外地区，包括今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印度的部分地区。时间范围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达2千多年。时空差距如此之大，内容也非常丰富多采。全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名胜，历史沿革、风土民情、人物掌故等许多方面。为了写好这部书，酈道元的首要工作，也是基础工作就是最广泛地搜集资料、占有资料。

说来容易，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查某种资料可以去图书馆，还可利用许多现代化手段。而在酈道元的时代，只有著作者一人之力去努力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封建国家的图书馆只对高官和史官开放，而且管理很严。道元到皇家图书馆查书也不可能很方便。那么他只有依靠原来家藏的图书，另外就是利用到各地任官时机，搜集地方的图书。为了撰写《水经注》，道元到底搜集了多少种资料现在已难以查清。各代学者经过统计，大约《水经注》列名引用的文献就有480种之多（当然没有列出书名或者搜集到而没有用上的文献就更多了）。此外，《水经注》所引用的碑铭也有3百5、60种。在《水经注》所引文献所占比例最大的首推地理类文献，道元对这方面文献的搜集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的。从根本上说，《水经注》是一部地理书，那么它的资料来源就要求科学性和真实性，要严谨可靠，这种要求在那个时代是不容易达到的，一方面文字书籍的传播很困难。我们知道，唐代才出现雕版印刷，在这以前一切文献资料的取得只有通过抄书这一个途径。在今人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没有坚定的信念去搜求文献进行抄写保存，《水经注》是不可能写出来的。由于受到印刷技术尚未发明的限制，从一个地区看到另一个地区的书籍就很困难，对于搜集地理书籍更是如此。地理类书籍大致可为两类，一类是象《禹贡》、《山海经》等全国地理总论性质的文献，这种书名气大，流传时间久，人们比较重视，获得还比较容易。而另一类是区域地理分论性质的文献。这类文献多由本地区的知识分子或任职于当地的文人撰写，且多为魏晋南北朝这个“地理大交流”时期的作品。这些新著分散各地，抄本十分有限，获得更为困难。但是这些书的内容大多比较真实可信，而且是当时人所写，酈道元是很重视对这种书的搜集的。在《水经注》中关于关中（今陕西省中部）的地理书有5种，中原地区的有8种、山西、河北的有4种，西北地区的有7种，山东江苏北部的有3种，东南地区的有13种，湖南、湖北的有9种，四川地区的有5种，岭南地区的有5种，以上九个区域的地理书达59种，在《水经注》所引地理类109种文献中占一半以上，这些区域地理著作绝大多数都是魏晋以后成书的，代表了当时地理学的新成果，道元能及时利用这些文献无疑为《水经注》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除了这些文献，道元还十分注意对地图的搜集，在写作《水经注》时他常常与地图进行核对。此外，道元还收集了一些难得的书信资料。书信资料大多均为真人真事，对地方景物的描写的可信程度是极高的。至于他所引用的碑铭其价值自不待言，碑铭文字的本身能保存下来就是一种功德无量的事。总之，道元尽其所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广泛收集资料，为这部巨著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知道，道元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官场之中，决定了他不能有大块时间来专门从事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这就更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谨踏实的态度。

进行学术研究时认真收集占有大量材料，是任何一位学者在从事研究前所要从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道元的资料占有可以使我们再次体会到这一点。不仅学者如此，其他人在做一件事之前不是也要经过一番掂量吗？从郦道元的资料搜集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学术事业是一丝不苟的，他的成功，也就不是偶然了。

经过广泛搜求，道元占有了大量资料，这是做学问的第一步。仅有这一步是不行的，接下来就是对数量庞大的各种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去伪存真。上文也说过，道元所引的文献只是占有材料中很少的一部分，有数量更多的材料在经过他的审查后都没有写到注文中去。

《水经注》是以《水经》这部书为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广征博引，详加注释。但由于《水经》内容十分简略，在字义理解上很容易出错误，于是道元首先就对《水经》原文下了一番考证功夫。结果，他在《水经注》中明确指出了《水经》原文中的30多处错误，从中亦可见道元治学之严谨。有时他并不直接指出《水经》的错误，而是在注中进行改正。比如说，《水经》原文讲一条叫原公水的河流注入汾河（在今山西省），道元则在注文中说，原公水注入文湖，不流入汾河，这样的注文实际上改正了《水经》原文的错误。

《水经》说泲水东流入海，称水是在今朝鲜半岛上的河流。道元没有轻信原文，为了取得实际证据，他访问高句丽（当时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国家）到北魏来的使者，纠正了原文中的错误。关于这条河的流向，许多古书都说成是东流。其实在朝鲜半岛由于地势的关系，许多河流都是西流入海的，一些学者不了解实情，生套我国河流多东流的定式，所以出了这个错误，《水经注》纠正了《水经》原文的错误，也是对其它古书中这个错误的纠正。以上是他纠正《水经》的失误，在分析资料时，道元对不少地理书中的错误也进行了纠正。

在《水经注》中可以看到道元分析古资料的细节，他常用和第一人称来表达他分析资料的过程，常用的话如，“余考诸地说，”，“余按群书”等等。“余”就指道元自己。

由于《水经注》所涉范围太广，材料又多，对有的问题虽经分析但一时仍得不出肯定的结论，这时道元就把各种材料都摆出来，写清原因，不作结论，也不轻易否定他人的说法。这种谦逊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现代地理学家把研究工作分为两大部分：室内、野外两部分。以上讲郦道元的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实际上都是室内工作。作为地理学家必须要进行野外考察，这也是道元在《水经注》序中提到的。野外考察是郦道元治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水经注》能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地理大交流”以前的地理著作多缺少野外考察的基础，以至书中虚构成分较多。”地理大交流“时代的许多地理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象《水经注》这样能大量运用野外工作成果，取得重大成功的著作还很少见。道元从事野外工作的方法和成果，标志着我国古代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受到后代地理学者的推崇。

郦道元从少年时就随父在外，对周围野外景物养成了悉心观察的习惯。在随父住青州时，他对那里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水经注》中这一地区也是写得很扎实的部分。他对营丘的考察可以看成他从事野外考察成果的一个典型。营丘是先秦时就很有名的一个地方，但古书中却连它的位置都没有

交待清楚。道元利用在青州的地利之便，对营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结果表明，所谓营丘只是一小土岗，“周围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即北侧七丈五）”，与古书记载相符。就在当时临淄城中。这样把营丘的位置、长度、高度等都做了明确的记录。营丘只是一个小土岗，道元也下了很大功夫去进行考察，可见他在野外考察中是非常细致踏实的。他的这种精神，也使《水经注》的质量和水平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

道元在入仕前几年曾随孝文帝到北方巡视。使他获得了大量野外考察成果。特别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记载了旅途中发现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岩画。这些岩画在近年已被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再次发现。在今内蒙古阴山地区的浑山幽谷和山崖上已经找到了一千多幅各种内容的岩画，这些岩画表现了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北方游牧生活的各种场面，为我国民族历史的丰富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次考察，正是根据《水经注》中提供的线索进行的，从而获得了重大成果。郦道元在 1400 多年前的辛勤劳动给今天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水经注》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道元的野外考察工作并不是随便浏览，一般总是与地图、文献对照，有时还与当地人民交谈，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的野外考察方法。道元通过亲身考察，纠正了许多古地理书的错误。比如对于泗水的源头，各种文献记载都不同，道元就亲自去考察，于是发现各种文献的说法都是错误的。道元有完整周密的方法和敬业精神，因此他的成果大多确实可靠，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考察濡水沿岸的古墓时他就采用访问和文献索引相结合的方法，在任鲁阳太守时，他结合地图、地方文献进行野外考察，查勘了汝水的源头情况。这些都是道元从事野外考察的实例，可见他是非常认真细致的。由于时代所限，道元不可能亲临南方考察，在记载南方的水道情况时难免有些错误，与这部巨著相比，实属瑕不掩瑜。道元在写作《水经注》时所采用的治学方法才是我们在学习工作中应该学习的。我们不一定是地理学家，也不必考察水道变迁，但郦道元踏踏实实做基础工作，坚持追求真理（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做人上）对科学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干哪一行都不能缺少的。

五、郦著《水经注》的贡献

以上我们介绍了郦道元的思想和治学方法，都是围绕着《水经注》来讲的。《水经注》这部巨著本身就是郦道元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财富。

前面谈到郦道元长期在北魏政权中任职，孝文帝时期的昌盛景象，或许对道元产生了很强的写作欲望，他要写出一部与这个王朝的气势相匹配的地理著作来。但是他并没有大段时间来写作。可以说这时还处于资料整理阶段。在道元任东荆州刺史时曾受到免官处理，这一免就是好几年，这时道元的心情比较低沉。孝文帝突然去世后，北魏国势急转直下，道元看到这种情形又无用武之地，在朝中又遭权贵排挤，他已认识到北魏的兴盛时期已过，朝廷腐败不可挽回。面对此情此景，道元决定利用赋闲在家的时间把希望寄托在写作上，《水经注》大概就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当然可能现在看到的《水经注》并不是一个完成稿，因为道元被叛兵杀害实出意外，有些内容的删改修正尚来不及完成。尽管如此，《水经注》对我们的贡献仍是巨大的。它的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不同学科，不同社会层次的人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有所收益，相比现代的一些著作其内容可谓丰富，涉及自然、社会科学

的诸多学科。郦道元在无意中收录的许多内容对学术研究起了重大作用，这或许是他写作《水经注》时所没有想到的。

从总体上讲，《水经注》对我们后世的贡献功绩可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水经注》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地理学著作。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地理大交流”的时代，也是我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可谓人才辈出，地理学界也是如此，涌现出众多的地理学家和地理学著作。郦道元和《水经注》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时代代表。

第二、《水经注》是一部思想性很强的地理学著作，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突破了地理著作的框框，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一部感情丰富，有极强感染力的巨著。郦道元对祖国早日统一的渴望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浸透在全书的字里行间。

第三、《水经注》对地理学的发展成熟具有重大意义，对许多学科的深入研究有重要参考作用。说《水经注》是一部巨著，不是单从字数上说，当代许多著作的部头都要超过它，但书中内容的覆盖面之广是不能与之相匹敌的。所谓“巨著”必在本专业基础上能给人以启示，且在其它领域同样给人以帮助，使读者有所思有所想。以此标准衡量《水经注》，确是当之无愧。

第四、正是在以上几方面的成就，由《水经注》一书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之学——“郦学”，这在地理学，或科学史其它门类中都是少见的。由于《水经注》内容宏大，涉及面广，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自明朝以来有了极大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郦学研究正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重视。各学科的学者对它的热情也与日俱增，一个研究郦学，发扬郦道元思想，学习其治学方法的学术高潮正在酝酿之中。

这一部分我们就分学科地谈谈《水经注》的价值和贡献。

《水经注》归根到底是一部地理学著作，因此它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地理学方面。

地理学是综合学科，分支很多。《水经注》是专门研究水文变化的专书，属于河流水文地理范围的著作。我国悠久的历史上有大量的地理著作问世，但在这一领域内，《水经注》的地位是无人能比的。其它的一些此类著作不是内容呆板，就是内容简略，象郦著这样大部头全方位介绍全国水的专书可以说只此一本，在本专业内，郦著《水经注》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水经注》也是一部以河流为纲介绍全国的地理著作。它以西汉版图为基础，对如此广大的地区的主要河流及其流域地区进行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在内的综合性描述。这种类型的著作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禹贡》是较早的一部，但其中虚构成分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是不能与《水经注》相比的。

在地理学发展史上，《水经注》以前的著作大多没有野外实地考察的基础，这样，地理著作的可靠程度仅凭文献资料是难以保证的。地理大交流时代的地理学家开始重视实地考察，代表就是郦道元。道元身体力行，广泛利用实地考察的成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它地理学著作，从此，实地考察真正成为地理研究和著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从郦道元开始，野外考察与地理文献研究相结合。《水经注》对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成熟与完善有重大推动作用。

许多地理著作由于受体例、内容、制板的限制。《水经注》同样是学术著作，而在文字上十分生动，内容丰富多变，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水平。《水

经注》的成功是区域地理著作在地理学史上一个突出的例子。

《水经注》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河流，它在自然地理学上的贡献，首先在河流水文方面。从河流数量上讲，《水经》原文中只列了137条，而注文中记载的达1252条，多出11倍。对这些河流，《水经注》大多记载了它们的发源、流程和流向，叙述紧扣河流的自然地理特点，对于发源地相近的，注文一般将它们归在一起记述，如卷九把发源于太行山东、南山麓的清水（今卫河），沁水（今沁河）、淇水（今淇河）放在一处。对这三条小型河流，道元也很认真，分别叙述了各河源头的情况。虽然发源地相近，但源头情况并不相同，清水源头处于一个地下水丰富的小盆地，沁水上源则有許多支流汇成，而淇水源地由于地形复杂，水源是由山间的一瀑布急流形成的。这些小河并不很有名，道元仔细进行研究，给今天研究自然地理和对河流水文的考察都有重要意义。

在河流源地开始的整个流程中，《水经注》对河床宽度、瀑布、急流、峡谷等情况都有详细的叙述。对岷江上流的记载就很典型：“两山对开，其形如阙，谓之天彭门，亦曰天彭阙，江水自此已上微弱，所谓发源滥觞者也。”这是岷江最上游的情况。接着注文分段叙述了流程情况：“江水自天彭阙东迳汶关而历氏道县北……自白马岭回行二十余里至龙涸，又八十里至蚕陵县，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镜，又六十余里而至北部，始百余步（指河流宽度）。又西百二十余里至汶山故郡，乃广二百余步。又西南百八十里到湿坂，江稍大矣。”这样注文把各个河段的长度和宽度交待得很明白，如用这段珍贵的古代自然地理资料与现代的情况作比较，那么这一河段在历史上的变化就可以了如指掌了。

峡谷险滩是河流流程中常见的，也是河川研究的对象，《水经注》对这方面的叙述也很丰富。如上文中我们介绍的孟门、三峡，还有黄河上的龙门、三门、洛水上的伊阙，湘江上的空冷峡等，全书中记载的峡谷近三百，许多都叙述得绘声绘色，成为著名的散文名篇，象三峡那段就是其中之一。

瀑布对河流水文研究也有重要价值。《水经注》中共记有60余处，地理位置准确，还记载了不少瀑布的高度。关于瀑布的名称，《水经注》中有很多别称，如飞波、飞清等，这是《水经注》在语言文学方面的贡献，后文还要述及。

对河流水文的其它要素如含沙量、水位、流速、冰期等，《水经注》也有详细记载。黄河的含沙量世界上罕见，《水经注》上说：“河水浊，清澄一石水，六斗泥。”就是说，从河水中提一石水，其中有六斗都是泥沙，可见含沙量是相当大的。我国北方河流冬季都有冰期，《水经注》记载黄河“寒则冰厚数丈”，这就是冰层的厚度，还记载了黄河上几个可以采冰的河段。

河流以外《水经注》记载了许多湖泊，据统计超过了500处。大量的淡水湖，如洞庭湖、彭蠡（今鄱阳湖），太湖，现在已经消失的，如巨野泽（在今山东省境），圃田泽（在今河南省境）。还有一些咸水湖，如蒲昌海（今罗布泊，在新疆），居延海（在今内蒙古西部）。《水经注》对这些湖泊的记载，在湖泊地貌、水文方面都提供了许多资料。湖泊形成后，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中，总是在不断淤浅，甚至最后变成洼地，这种过程，地理上称为湖泊的沼泽化现象，许多大湖都是这样逐渐消失了。《水经注》就记载了圃田泽消失过程中的情况。“（圃田）泽在中牟县西……东西四

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冈，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径通，渊潭相接，各有名焉……浦水盛则北注……” 阡田泽是古代有名的大湖，在先秦的《诗经》中已有记载。但由于湖泊的沼泽化过程，到了郦道元著《水经注》的时候已经分化成了二十四个小湖，文中所谓“沙冈”，即湖底泥沙增多，湖水变浅的现象，是沼泽化的现象，唐宋以后阡田泽就完全消失了。湖泊这种由大到小，由整体到分散的过程，具体说明了阡田泽的湮废过程，《水经注》的翔实记述为我们了解研究湖泊沼泽化过程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数据库。

《水经注》中对地下水的记载也很丰富，共记述了泉水 200 多处，温泉 38 处。还记载了分布在各地的水井，对了解古代地下水位很有参考价值。

《水经注》对动植物地理也有许多记载。全书记载的植物达 140 余种，包括在我国常见的温带亚热带的森林，也有西北干旱地区的草原，荒漠植被，还记载了我国南方和今中南半岛的热带森林自然景观。《水经注》记载的动物有许多已在我国绝迹或在分布上有很大变化，使我们更便于研究古今动物地理分布的变迁。如《水经注》中记载了一种称为“水虎”的动物，就是今天的扬子鳄，当时还可在今汉水中看到，可现在的扬子鳄只有在长江下游的少数地方还有少量分布。扬子鳄分布地区呈现出逐渐退缩的状况，数量也大减，因此我们就更要保护它了。

以上讲的是《水经注》在自然地理学上的贡献。在人文地理学方面也是如此。

郦道元很重视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与水的关系极其紧密。《水经注》中处处体现着郦道元对农田水利的重视。对许多大型设施的记载都很详细，如我们上文中说过的芍陂，车籍渠等。在重视农业的同时，《水经注》也留下了对手工业介绍的珍贵资料。书中记载手工业的门类比较齐备：采矿、冶金、纺织、造纸、食品等等，还记载了能源矿物如石油、天然气、煤，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锡等，非金属矿物如硫黄、盐、云母、石英等，对它们的分布和用途都有介绍。在所有手工业中记载最多的是制盐业。古代盐是关系民生的大事，所以郦道元很重视，《水经注》中记有海盐、池盐、井盐、岩盐等多种。卷 33 记载了四川井盐的位置、数量，并说“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可见四川井盐的质量是较高的。卷六《涑水注》记载了当地的池盐。池盐在今山西西南的安邑一带。从先秦时代开始，这种池盐就行销中原广大地区，有的商人就靠贩运池盐发家致富。郦道元是这样描述的：“今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这里的产量相当稳定。而且提取方便（所谓“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所以长盛不衰。

《水经注》的记载与其它史书的记载互相映照，不难看出，安邑池盐在中原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水经注》把汉代与北魏盐池作了比较，这种资料是很珍贵的，对我们今天如何更好地利用盐池也有现实意义。

此外对沿海盐场的分析和采制，《水经注》也记述得很普遍，卷九记载了今渤海沿岸的盐场，全书共记盐矿、盐场二十多处，包括了当时国内的著名盐产地，有的地方还带述了境外的岩盐（见于第一卷注）。

在陆路交通并不很发达的古代，水运是很便捷的交通方式。全书所记河道，大多都涉及航运。而峡谷，险滩就成为航道中的险段。如卷四记黄河在砥柱山以下，“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卷四十记浙江在寿昌，建德八十里中有十二濑，“皆峻险，行旅所难。”

当然，道元对陆路交通也同样重视。书中记载了当时许多国际陆路通路：卷一的葱岭、天竺（今印度）道通向北印度，中亚地区：卷一还有林杨，金陈道通今柬埔寨一带；卷三的鸡鹿塞道通向漠北草原。国内要道记载的就更多了，卷四的函谷关道，“号曰天险”。卷二十七的通关势为沟道关中和汉中（今陕西省秦岭以南地区）的要道。卷三十六记述了麻降（今云南省曲靖县境内）一段道路：“麻降贾子，左担七里。”那里的商贩为走山路、要用在肩担走七里不能换肩。只四个字就把山路的险窄勾勒出来。

大量水陆交通道路必然形成许多道路交叉点，注文中相应出现了大量的桥梁和津渡，共达二百多处。《水经注》中出现的桥等形式很多，有石拱桥、木桥、索桥、浮桥等等，卷19《渭水注》记载了宏大的秦渭桥：“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南有长乐，北有咸阳宫，欲递二宫之间，故造此桥，广六丈，南水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座大桥。卷16的旅人桥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船过也。”这是一座石拱桥，赵州桥是为大家熟悉的，而旅人桥更比赵州桥要早。

城市是人口集中居住区，道元自不会放过。全书中共记县以上城市尽3000座，古都达180座，其中大部分与今天已经成为遗址，有的连废墟都找不到了。如果能按照《水经注》的记载进行考察，很可能会有很大收获。道元对古都的记载最为详尽。卷16注文中竟用7000字的篇幅来详细描述当时北魏的都城洛阳。在全部《水经》每一句经文之后的注文中，这是最长的一篇。对古都长安，邺都也有详尽描述，其它的古都还有平城、成都等等。对这些历史名城的介绍，都结合历史的事迹，宫殿、园苑、池台、巷市的遗址调查，详尽周到，读者从中不仅能增长地理知识，同时也提高了历史和考古知识，增长了见识。

《水经注》还记载了国外的城市。卷一记载了现今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境内的一些古都，如波罗奈城、王舍新城等。卷36记载了古代林邑国的区粟城和和典冲城，位于今越南中部。对其位置、形势、建筑规模等都描绘无遗。郦道元没有到过那里，这些记载都是从《林邑记》中抄录的。现在《林邑记》早已在历代战火散失了，这段文字就成为孤本，是记载这两个城市的唯一古代材料，对研究越南古代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可见，《水经注》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地理学的范围。对于较小的城镇被称为聚落，别称有很多，对这种小地方郦道元也没有轻易放过，全书中约记载了一千处左右。

生活在战争频仍的时代，郦道元虽反对不义之争，但他并不是消极地反对。《水经注》中也保留了大量军事地理的资料。道元常把在战争中发生重大作用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要素如河流、桥梁、道路、津渡等进行军事上的评价，这种作法在以前还不多见，对后代的军事地理学者有很大影响。卷三对高阙（在今内蒙古）的平价就是一例：“山下（指阴山）有长城，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自阙北入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杆，以防塞道。”后一句就是道元的评价。对有些战役的描写也很详尽，与战场的山川形势相系，有重要的军事地理价值。卷十七记载了三国时诸葛亮进攻陈仓城的过程：“魏明帝遣将军太原郝昭筑陈仓城，成。诸葛亮围之。……亮以数万攻昭千余，以云梯、冲车、地道逼射昭，昭以火射连石拒之。亮不利而还。”这次战役诸葛亮几万人攻不下陈

仓城，一方面是郝昭有力，同时也由于陈仓城的地形险要，注文中引用诸葛亮自己的话：陈仓城“山崖绝险，溪水纵横，难用行军。”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中也有这段叙述，罗贯中一定看过《水经注》的这部分内容然后再加以润色。诸葛亮在失败后能自己分析原因，抓住了问题要害，诸葛亮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看到了军事地理在战争中的作用。《水经注》的记载也使我们丰富了对诸葛亮的认识。

卷 34 记载了三国时期刘备与陆逊在长江三峡地区的战役，同样有声有色：江水又东迳石门滩，滩北岸有山，山上合下开，洞达东西，缘江（即沿江）步路所由。刘备为陆逊所破，走径此门。追者甚急，备及烧铠断道。孙恒为逊前驱，奋不顾命，斩上夔道，截其要径。备逾山越险，仅乃得免。”江边的陆路要通过山洞，刘备就烧掉铠甲拓断道路，而追兵却奋不顾生，刘备只好逾山越险，十分狼狈。这场追击战紧紧围绕江边山川险地展开，《水经注》描述把二者相结合，才能写得很成功。

《水经注》对地名学的贡献也很大。地名学是一门研究地名的学科，它研究地名的形成、发展变迁，以及地方命名的原则和得名的渊源。在《水经注》以前的古地理书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地名，但与《水经注》相比都不能望其项背。《水经注》中记载的地名据统计达二万左右，这是前所未有的。

河流地名是各类地名中最多的，占全书地名的 20%。江在古代指长江，河专指黄河，这是专称，后来都成为通称。北方河流后来多称“河”，而南方河流多称“江”，其它河流称“水”，人工开凿的河流又多称为“渠”。《水经注》在记述名河名称，还记了许多河流的旁名别称。黄河的名称就不少，如河水，河、大河、黄河、浊河等等。

《水经注》还担负着解释地名的工作，它解释的地名共达 2400 处。其内容非常丰富多采，把它们按地质分类，有的学者分为 24 类。可谓洋洋大观，自《水经注》以后，地名渊源的研究分析，逐渐成为我国一切地理书中的必备内容，《水经注》的贡献尤为卓著，丰富了地名学的研究内容。

《水经注》是学术著作，而不是文学专著，但郦道元有深厚的文学修养，重视语言文字运用，把这本学术名作写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在语言学和文学上也有很高价值。

郦道元运用语言能力很强。他描写风景语言新颖，绝少用前人的套话和陈词滥调。《水经注》涉及到许多河流的源头，一般的作者的论述往往大致相同，没有新意。道元却很能抓着景物特点加以描写，如“俯视游鱼，类若空悬矣。”“水色清澈，漏石分秒”就是两个出色的比喻。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小石潭记》也是一名篇，写到潭水的清澈：“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后半句实际上是从郦道元“鱼若容悬”一语中借鉴而来。

许多地理景物多次出现，容易使读者厌烦。道元就力图多变，给人新鲜之感。例如瀑布在全书中出现多次，道元就使用了许多同义词来表示瀑布：如“洪”、“悬水”、“悬流”、“悬涛”、“悬波”，“悬涧”、“悬泉”、“飞清”、“飞波”等，给人以联想的余地，我们怎能不认为道元也是一位语言大师呢？

《水经注》还注意吸收人民的语言。在卷三引了一段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这是用来反对和谴责秦始皇的暴政的，道元的评论是：“其冤痛如此矣。”这种民歌道出了人民的疾苦，代表了人民的呼声，因此也感动了郦道元。道元联系到当时国家的危剧，

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描写河流的河道，《水经注》还利用当地的渔歌和船谣，卷 34 为描写三峡黄牛滩的曲折引用了这样的歌谣：“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又卷 38 写湘江的弯曲：“自长沙至北，江湘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渔者歌曰：帆随湘转，望衡（指衡山）九面。”这些歌谣中多少有些夸张成分，但确能说明问题，也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如写秦岭之高，卷 18 引俗谚：“武功太白，去六三百。”这些歌谣谚语的运用，增强了注文的语言感染力，使全书光彩倍增。

魏晋南北朝时代，我国北方出现民族大迁徙，北魏时期更有大融合的趋势。与此同时，各民族的语言互相接触，在《水经注》中也留下了一批少数民族语言的译音文字。如卷三中一段注文：“河水又东，薄骨律镇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这座薄骨律城位于黄河中的一个岛上，原来是夏国所建（夏国是十六国时期以匈奴人为主建立的政权，国王姓赫连），还有原来的桑果林。到了道元所处的北魏时代，已经搞不清楚薄骨律的确切含义了，于是道元说“语出戎（借指匈奴）方，不究城名。”大概薄骨律是匈奴语的地名。由于民族融合的加快，大量以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慢慢消失了。《水经注》所记下的无疑对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有重大参考价值。

《水经注》在文学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前面引过孟门和三峡的描写，就是道元描写实景的著名篇章。在写作方法上，该书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在全书结构上，采用了网络状结构。叙述河流都从源头开始，沿主干展开，有支流注入的，再分述支流，也是从源头开始，如支流仍有小的支流仍然依次类推，最后再回到主干上来。本书以空间变换为经，以河流附近地方历史变革为纬进行结构，但往往又沿着河水流向变换着所描述的地方的历史，又由此形成了时间、空间相结合的结构。这种方法打破了地理专著的范围，为更多的读者所喜爱。地理学家从中研究山川河道变迁，而历史学家可发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当时所生活的环境，文学家从中品味到作者艺术手法的高超，一般的读者从中吸取到各种知识，如果出门旅游之前，阅读本书的有关内容，相信会加深对游览地区的印象。

本书注文之丰富，已远远超出地理范围。特别注重景物的描写和历史人物、事件及风土人情的记录，使本书的文学性极强，许多文学家把它当成一部游记散文书。当然《水经注》根本上仍是一部地理学著作，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文学上的成就，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能有这样一本包罗万象的游记散文来读，真是一件幸事。一般意义上的游记散文又怎能与它相比呢？

为了增加读者时兴趣，道元搜集了不少故事、传说，极具吸引力。为了解释“戏水”这个河流名称，道元就引用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朝的国主幽王为了博得美人褒姒一笑，竟燃起只有在外敌入侵时才能发出的烽火，使得许多诸侯上当，看到诸侯们慌慌张张赶到后的狼狈，褒姒笑了，幽王大喜，还赐给出这个主意的小人千金（即铜），这个故事又被称为“千金一笑。”等到敌人真的打来了，幽王再燃烽火，诸侯们以为又象上回一样，都没有来。结果幽王被杀，附近的河被称为“戏水”。插入这样的小故事具有劝戒的意义，同时增添了趣味性，大大提高了《水经注》的文学价值。这种故事书中还有很多。有人曾对郦道元引用过多的传说故事，乃至神话志怪故事提出异议，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苛求郦道元。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这

些内容本身就给了后代的文学家和读者以巨大的精神上的满足，这也正是郦道元著《水经注》的过人之处。

《水经注》一书中拥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因此它对历史学也有重要的价值。造纸技术在汉代就已发明了，但直到唐代才出现雕版印刷，因此关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书籍只有其当时人手抄才能流传下来，再加上国家政局动荡，战争频繁，当时的许多著作都失传了，而《水经注》能在北魏到隋之间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中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许多当时人的行动，当时的事件在《水经注》中都有记载，因此，《水经注》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历史书。在卷四，《水经注》记载了当时的一种名酒——桑落酒，经过与其它文献的核对可知这种酒在当时的首都洛阳也是十分有名，《水经注》还记载了桑落酒的具体制作过程，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酿酒技术及其发展有着重要参考价值，而这些记载在正史（所谓“正史”是历代统治者认可的官方史书）中是找不到的。

《水经注》对于研究秦汉史和历史沿革地理也有很大帮助。秦汉时期离开郦道元生活的时代为时尚不是太远，秦汉时期的书籍在当时还比较丰富，道元书中多有采用，特别是关于地方区划的沿革情况，在所谓“正史”中多有疏漏，《水经注》可以用来纠正和补充“正史”的错误和不足。

与历史学联系的水利史，建筑史资料在书中也有许多。前面提到不少古代水利工程均是水利方面的材料，对今天水利史研究多有启发。《水经注》对历代的建筑也多有描述。在简介各个城市时，一般对该城的重要建筑也加以叙述。对那些有名的宫殿记载得就更多了。卷 19 中阿房宫、未央宫等都是闻名的宏伟建筑。卷 13 记载了原来北魏首都平城的档案馆——白台，想必道元曾亲自到过。卷 28 记载郢城有大暑台，这是南北朝初期的建筑。此外《水经注》中还有不少对古代园林建筑，寺院建筑的记载，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

对考古学的研究，《水经注》也有帮助。比如前面我们所讲的阴山岩画的再次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水经注》的记载，达到“按图索骥”的效果。在古代曾有大量佛塔建筑，后代多有毁坏。《水经注》这方面的记载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帮了大忙。如《水经注》卷 16 曾详细记载了洛阳永宁寺的九层浮图塔，70 年代的发掘中就利用了《水经注》的资料取得了重大考古成果，考古结果的数据与《水经注》的数字材料基本吻合，再次说明了《水经注》内容的翔实可靠，对考古工作有很大帮助。

《水经注》引书达 480 种之多，其中大部分都在流传中散失了。有的古书只有在《水经注》中我们才能看到它的一鳞半爪，有的古籍在流传中大部分散失，相当一部分在《水经注》中可以找到，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历史资料。长期以来《水经注》在古文献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奉献。

以上我们只是介绍了《水经注》对地理、历史、地名、语言文学、考古、古文献等学科的价值和贡献，对我们研究或了解我国古代民族、宗教、金石、艺术也有它特殊的贡献，我们介绍的只是它的主要价值所在。

六、“郦学”

《水经注》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是郦道元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郦学”是研究《水经注》的一门学问，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无所不包，为各学科的学者所倾目。

郦著《水经注》自成书后，经过了北魏末到隋朝统一这一段战火年代得以保存下来，隋唐时期一直做为官书藏书，唐朝中期以后逐渐流入民间，以后历代研究者层出不穷，到了明末清初形成了“郦学”研究的一个高潮，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水经注》是在经文后面加上注文，在长期流传中经文、注文已经难以分清，这是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有几卷在流传中有散失情况，为《水经注》补足也是一个研究课题。经过长期的努力，到清代以上两个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研究《水经注》的学者逐渐增多，出现了不同的流派，有清代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人的研究被称为考据学派。后来地理学派逐渐为人重视。考据学派的贡献主要是完成了对《水经注》本身的修补整理工作，上面两个问题就是他们解决的。地理学派的任务是如何发挥《水经注》的实际功效，为更多的人服务，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价值。近代以来地理学派的代表杨守敬、熊会贞所作《水经注疏》是《水经注》研究的重大成果，使《水经注》的地理学价值得到更好的发扬，推动了“郦学”的发展。

解放以来，特别是70年代以来，因内（港台地区）的学者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有几种新的版本的《水经注》问世。《水经注疏》的两个版本先后于50、70年代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到了80年代末国内学者又集这两个版本优点，将《水经注疏》点校出版。我们知道古人写书不用标点符号，这就给我们利用《水经注》带来了很大不便，这个点校本的出版使更多的人能较方便地阅读《水经注》这部巨著了。但是大部头的《水经注疏》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仍然不很方便，近年又有点校本《水经注》出版，这次点校是以清代《四库全书》的版本为基础点校的，给一般熟悉古文的读者的阅读带来了方便。现在白话全译本的《水经注》也已经出版发行了，采取古文、白话文对照的形式，这样我们许多不熟悉古文的朋友们也可以很方便地阅读这部名著了。以上这三种不同版本的《水经注》基本上满足了各个层次读者的需要，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对这本书产生兴趣。

“郦学”在国外特别是日本也有很大发展，在某些方面还要超过我国，这就促使我们的青年一代能再接再厉，把“郦学”研究进一步深化，为我们祖国的建设发展服务。

后记

这本小册子是对郦道元这位古代学者的简要介绍和评论。所有内容都尽量与《水经注》相结合，如果脱离《水经注》来评论郦道元这个历史人物是不可能的。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变革时期，它造就出一代伟人、一代学者。郦道元和他的《水经注》著作，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郦道元无疑是这个时代杰出人物中的成员之一。他的为人学给人以启示，值得后人学习。《水经注》这部宏篇巨制正是郦道元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为人清正，为学严谨，不愧为那个时代的巨人。从他身上我们感到的是一股浩然正气，也再次体会到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强烈气息。从他身上也体现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和使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巨大力量，这正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民族精神。

